

图书情报与档案管理学科中的文献学教育^{*}

The Philology Education in the Discipline of Library, Information and Archive Management

王余光

Wang Yuguang

摘 要 近十年间,中国图书情报与档案管理教育的发展呈现出教学点数量稳步发展、相关专业日趋融合的趋势。作为图书情报与档案管理学科的基础课程,文献学课程在本科生阶段至少应包括中国文献学和中国文献发展史两门课,在研究生阶段也至少应包括中国目录学、中国版本学两门课。

关键词 图书馆学 情报学 文献学 基础教育

Abstract: In the recent ten years, the development of library, information and archive management education shows some trends as follow: the number of teaching points is increasing steadily; related majors are becoming fusional. As the foundation course of the discipline of library, information and archive management, the philology should contain at least the two courses of Chinese Philology and History of Chinese Literature Development in the phase of undergraduate, and Chinese Bibliography and Chinese Bibliology in the phase of postgraduate.

Keywords: Library Science; Information Science; Philology; Basic Education

继1997年《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目录》修订之后,教育部又于2010年启动新的修订工作,并于2011年5月和10月先后下发《修订一稿》和《修订二稿》,征求意见^①。在修订后的《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目录》中,图书馆学所在的一级学科名称将更改为“图书情报与档案管理”(相当于台湾地区的图书资讯学),这样即与研究生专业目录相一致。在“图书情报与档案管理”之下设立三个专业:图书馆学、档案学、信息资源管理^②。这次目录的修订,对图书馆学及相关学科的招生、专业融合、课程整合等都有一定的影响。

近十年间,中国图书情报与档案管理教育的发展有着如下趋势:

一、教学点的数量有稳步发展的趋势。据相关数据显示,图书馆学本科教育基本稳定,研究生教育点发展较快。情报学研究生教育持续发展。档案学教育从本科生到博士生教育也基本是平稳发展^③。从数量看,近十年中国图书情报与档案管理教育的发展主要体现在研究生教育上。从事业发展与教育发展的关系上看,事业发展对人才的需求,在教育上的体现,如专业设置,

^{*} 本文是作者2011年10月参加台湾大学图书资讯学系主办的“图书资讯学教育趋势与愿景国际学术研讨会”所作的演讲稿。

^① 中国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目录对学校招生、培养目标、课程设计都有重要影响。目录的制订与修订,都由国家教育最高行政机构负责,大学没有增减专业目录之权。近十年间,一些重要的大学,开始可以自主增设专业。但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目录的作用仍然很大。上次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目录修订还是在1997年,次年公布。这次修订工作于2010年开始。笔者参加了这两次修订工作。

^② 在研究生目录中设图书馆学、情报学、档案学三个专业。

^③ 参见潘燕桃《中国图书馆学情报学档案学教育最新进展》,载《信息管理教育研究》,中山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该文统计,2007年,中国(大陆地区):图书馆学本科教学点26个(2008年底增加至29个),硕士点42个,博士点8个。情报学硕士点65个,博士点8个。档案学本科教学点31个,硕士点25个,博士点4个。这比20世纪末有较快增长。

往往滞后。近十年,图书情报与档案事业发展很快,但还仅限于大中城市或大学,在技术含量上也有很大提高,因而对研究生的需求增多,从而促动研究生教育的发展。而一些基层图书情报与档案事业的发展还不够快,故对本科毕业生的需求并没有明显增多。可以预计,未来十年,随着中国中西部地区与基层的图书情报与档案事业的发展,图书情报与档案管理的本科生需求将会增加。

二、相关专业的融合成为趋势。随着计算机与通讯技术的发展,人们从阅读习惯到信息获取行为,都发生了较大的改变。也可以这样说,技术改变了传统图书文献的出版、传播与获取、收藏等模式,这种模式的改变,影响着人们阅读与信息获取的方式。而人们阅读与信息获取的方式的改变,又促使技术不断改进,以适应人们的需求。这种变化在图书情报与档案管理教育上的体现,一方面,技术方面的课程不断增多,原有的一些核心课程也因技术的发展而改变,如分类、编目及检索等课程;另一方面,由于图书情报与档案管理在技术上的相近,相关专业的融合成为趋势。在图书情报与档案管理教育领域,按一级学科招生或设立课程,已在不少大学推行,这也对现行的课程体系提出了挑战。这种变化对图书情报与档案管理教育培养人才的目标亦有重要影响^①。

近十年来,中国在大学本科阶段,强调素质教育(或称通识教育)。但对素质教育,还没有比较一致的看法。我的理解是,素质教育或通识教育就是古典教育。而古典教育给学生的是一种文化、价值、气质、写作能力、教养与对传统的尊重。

而就一个学科的本科阶段而言,在素质教育的背景下,则注重基础教育。对图书情报与档案管理教育来说,基础教育是什么?

对这一问题,或许有很多不同的意见。如果我们把计算机及相关技术作为一种工具,那么文献学应当是图书情报与档案管理的重要基础。进一步说,文献学教育对于图书情报与档案管理学科教育而言,就是专业的古典教育。这一教育不仅给学生关于图书文献的基本知识,更重要的是给学生一种图书文化、价值与传统。这或许可以说,图书情报与档案管理学科,作为一种应用学科,在技术层面上,是没有国界的,但在思想、文化、价值、传统上,是有国家、民族或区域特色的。而文献学教育,正体现了这一特色。

在中国图书馆学正规教育的九十年中,文献学及相关课程一直是这个专业的基础课程^②。早在文华图专时期,该专业开设了与文献学相关的中国目录学、中国版本学等课程^③。20世纪50至80年代,北京大学与武汉大学的图书馆学系,也开设了相当数量的文献学及相关课程。近十年间,由于技术的因素,在图书情报与档案管理本科教育中,文献学及相关课程大幅减少,有些教学单位甚至取消了这方面的课程。我以为,这正是图书情报与档案管理教育中基础不扎实的重要原因。

作为图书情报与档案管理学科的基础课程,文献学课程应有什么内容与特色?对此,教育界也没有给予应有的关注。根据我自己近三十年文献学教学的体会,对图书情报与档案管理学科中的文献学教育,提出以下几点看法:

一、在本科生阶段,文献学课程至少应包括两门课:中国文献学、中国文献发展史。

二、在研究生阶段,文献学课程也至少应包括两门课:中国目录学、中国版本学。

目前,中国目录学、中国版本学两门课程的教学内容相对稳定,争议较少,均可供图书情报与档案管理学科采用。而中国文献学、中国文献发展史的教学内容还不够稳定。

① 2005年,美国 I-Schools 联盟成立,探讨本学科的定位、认同与学科整合。

② 文献学课程,中国大学多开设在文、史两系,名称或曰古典文献学,或曰历史文献学,以培养学生阅读、研究文献的基本能力。在图书情报与档案管理学科,开设该课多称文献学,其内容、目标与训练,亦与文、史两系课程有别。

③ 参见《文华情怀》(武汉大学出版社2010年出版)中的相关论文。

中国文献学,所指的范围与古典文献学、历史文献学、传统文献学是一致的。除有特定的约定外,这些概念是具有相同含义的。我以为,在图书情报与档案管理学科中,中国文献学应当讲授:

1. 文献知识与重要文献;

2. 文献价值与社会性;

3. 文献整理,内容包括对目录、版本、校勘、辨伪、辑佚、类纂等方法的介绍。在本科阶段,只开设基本知识的介绍,到研究生阶段,再以专题设课,以满足图书馆一些特殊岗位的需要。现在不少图书馆重视特色收藏、战略收藏、地方文献、家谱、古籍保护与利用等,但图书馆学专业的学生并不能胜任这些方面的工作。

4. 文献整理成就的总结与文献学家。^①

近三十年来,这方面的教材也有几十种,其中一些文献学教材已趋成熟并很有影响,如张舜徽《中国文献学》、吴枫《中国古典文献学》等。

中国文献发展史,包括中国图书史、中国藏书史等相关课程。目前,这方面还没有成熟的教材,但图书史、出版史、藏书史等研究已有相当丰富的成果^②,为编写这方面的教材奠定了好的基础。

(王余光 教授 北京大学信息管理系主任)

收稿日期:2012-02-29

① 这方面笔者曾有数篇论文发表,后收入笔者论文集《文献学与文献学家》一书中,该书2008年由国家图书馆出版社出版。

② 如来新夏、谢灼华、程焕文、徐雁诸位学者的成果,包括编写的教材。

